

英 伦 阅 书 记（上）

李致忠

应大英图书馆邀请，英国文化委员会赞助，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至九月二十五日，赴英伦做短期访问，讲学三周。其间，英国朋友很理解我渴望多看点书的心情，故在日程安排上，提供阅览上，都尽可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三周虽短，看书却颇为不少。现就自识价值较高者，述录如次。

敦煌莫高窟藏经室，是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最早问津此室，携走室中大量遗书者，便是英人斯坦因。斯坦因先后从敦煌石室，敦煌、吐鲁番地区所携走的敦煌壁画、汉文及各少数民族文字的敦煌遗书、各种敦煌遗物，以及竹、木简、版牍等，现在都还比较完好地珍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和印度部。这些珍贵的文物和文献，早已和法国、德国、苏联、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藏的出于同室、同地的同类文献一道，形成了世界性的研究课题，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敦煌学。敦煌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任何一位敦煌学者，也只能就自己的专业所长，涉猎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我不是敦煌学的研究者，断不敢妄谈什么敦煌学。但就这次英伦所见之中国早期印刷品和各种装帧形式的敦煌遗书，谈一些印刷术和中国古代书籍史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其他一些藏书。

一、敦煌遗书中的早期印刷品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以下简称《金刚经》）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王玠刻本

全经作卷子装。卷首扉画框高24厘米，宽28.5厘米。正文前是净口业真言，凡五行；正文包括首尾题名，凡二百八十七行；正文后又是真言，凡四行；最后题款一行。总共二百九十六行，每行十九、二十字不等，总计约镌五千字。正文框高24厘米，正文全长463厘米。加上卷首扉画28.5厘米，总长则为491.5厘米。

卷首扉画描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坐祇树给孤独园对长老须菩提及众僧说法的故事。释迦牟尼佛端坐中央，妙相庄严，胸藏万法，神态怡然。长老须菩提褊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拾恭敬而向佛言。佛的左右，挺然屹立着两员护法天神，精神尚武，面目威严。周围环立着众僧和施主，亦洗耳恭听，神态度诚。在微风吹拂中，幡幢浮动，两位仙女驾着祥云飘然从左右而来。与之上下呼应，经筵前面却卧着两头勇猛的狮子，神态欲出，但又囿于佛法，表现得无可奈何。图中凡人物二十二，狮子二，加上经筵、经幢、祥云、砖地、莲座、佛光、显得构图错综复杂，但又中心突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人物形象各异，面部表情，站行神态都很生动自然。各种线条流畅明快。整个扉画显得古朴大方。

正文字体为端楷，浑朴厚重，气势磅礴。镌刻的刀法剔透稳健，行气严整。麻纸印造，墨色纯正。四周镌刻粗墨边栏，但文字行与行之间未镌界行。整个看上去，已是一幅相当成熟的雕板印刷品。

众所周知，雕板印书，唐初已有之。此后四川、两浙进一步发展，至此而相当成熟。唐朝的佛教，到了唐懿宗时，盛极一时。《资治通鉴》唐懿宗咸通三年（862），评论唐懿宗说：“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僧尼受戒，两街僧

尼皆入顶。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封建社会常常是上行下效，形成社会风气。唐懿宗身为皇帝，既然这么奉佛，足见佛教影响已遍及举国上下。在这种社会气氛下，出现王玠为父母双亲祈福而雕印的《金刚经》，就显得是很自然了。既是雕板印刷，按理绝不可能只刷印一份。而且既是“为二亲敬造普施”，那似乎就应该普施到各大寺院、佛塔，以充供养。惜只存此一件。但也就因为只此一件，才成为世界瞩目的珍贵孤本。这件珍贵的印刷品，在雕板印刷术的发展史上，在中国古代书籍发展史上、在版画雕印发展史上，在书籍雕印格式及插图形式上，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现存大英博物馆，并长期陈列在大英博物馆展览大厅的展柜中。几十年来，这件东西虽在各种书中屡见介绍或引用，但介绍和引用多为转引，且只介绍卷首扉画和卷末那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落款。这次笔者有幸目睹，并特允从展柜中取出，首尾全瞻，仔细谛审，故做如上介绍。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唐代印本 卷子装 题左街僧
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

此卷印文凡五十五行。麻纸印造。无边栏界行。版面格式分上下句，每行上下句之间空两字，以为间隔。通高为20.1厘米，全长150厘米。全篇作韵文，每句七八字不等。文义通俗，浅显易懂。如首句“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最后两句“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来。”镌刻的字体端庄，刀法剔透，近似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玠雕印的《金刚经》。英、日两国合编出版的中国早期版画，认为此件是唐代，即公元九世纪的印刷品。我看这一鉴定是正确的。此件亦是相当成熟的印刷品。从印纸墨色、字体刀法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印证。不过此件系通俗文字，不像《金刚经》那样严肃，故未雕边栏界行。

二十四孝，本是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产物，后来演成故

事，并附有各式各样插图，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影响极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宣传经旨教义，遂采取了“僧讲”和“俗讲”两种宣教形式，这对佛教深入人心，赢得众多的善男信女，起了极大的作用。其原因是来自印度的佛经有散文和偈颂两种。散文宜说，偈颂宜唱，这便造成了与中国说唱文学相结合的有利条件。进入唐代以后，佛教进一步盛行。而伴随着唐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壮大。为了迎合市民口味和引起听众兴趣，“俗讲”也逐渐摆脱原来一味讲经的轨道而变为通俗的文艺。不但用通俗的说唱形式，继续敷演佛经故事，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乃至现实题材的变文也相继产生。于是佛教的“俗讲”便赢得了“填咽寺舍”的听众和“感动里人”的效果。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了专业的说唱艺人。二十四孝押座文的产生，大概就是这种佛教“俗讲”演进的结果。

所谓押座文，有点类乎以后小说、戏曲的楔子、引子、得胜回头或宝卷的开篇。多数押座文内容与所要讲的正题有关，但有时也并不相干。二十四孝押座文，从最末两句看，似与本题有关。因为这两句说：“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来。”显然是下边要讲二十四孝这个正题的引子。英馆东方部只藏有这个引子，没有正文。这就不知道是否原来未刻，还是原已刊印而失传了。

二十四孝故事，讲的都是封建孝道，劝人孝敬父母，就会得到好报。如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埋儿”故事，说的就是郭巨上有老母，中有贤妻，下有弱子。因家贫无以为食，与妻子商量为保证老母，决心将他们的儿子活埋，免夺老母口食，以进孝道。结果是刨地不过三尺，刨出满瓮金银。从此发家致富，螽斯衍庆，在朝为官，享受荣华富贵。这本来已有相当大的感染力。但当着佛教徒把这些故事再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时，就又给这种孝道蒙上一层宗教的诱惑力。因为人间荣华福禄，终不如足登极乐，身成正果，永享清福，久受香火。这是就个人功利方面的分

析，深义盖远不止此。佛教徒的出家，与儒家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孝道水火不容。把孝道与成佛结合起来，有助于争取信徒。这大概就是圆鉴大师所以辩述二十四孝押座文的宗旨。九世纪出现这样的雕板印刷品，非但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在印刷史上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珍品。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圆鉴大师是如何将儒、释两家结合起来宣传孝道的，现将押座文原文选录如次，读者一看便知。

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

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

须知孝道善无疆，三教之中广赞扬。

若向二亲能孝顺，便招千佛护行藏。

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梵王。

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

慈乌返哺犹怀感，鸿雁才飞便着行。

郭巨愿埋亲子息，老莱欢着彩衣裳。

最难诳惑谩哀恳，不易欺轻对上苍。

泣竹笋生名最重，卧冰鱼跃义难量。

若能自己除讥谤，免被他人却毁伤。

大解报恩能蹶草，马能知主解垂缰。

休贪财货耽嬉欲，莫恼慈亲纵酒狂。

男女病来声喘喘，父娘啼得泪汪汪。

两肩荷负非为重，千远须弥未可尝。

勤奉昼昏知动静，专看颜色问安康。

吐甘咽苦三年内，在腹怀耽十月强。

试出去遥和梦逐，稍归来晚立门傍。

孝慈必感天宫福，五逆能招地狱殃。

勤苦却须知己分，资财深忌入私房。

须忧阴骘相摩折，莫信妻儿说短长。

自是意情无至孝，
四邻忿怒传扬出，
若是弟兄争在户，
至亲骨肉须同食，
□对语言宜款曲，
试乖斟酌亏恩义，
切要抚怜于所使，
姑姨舅氏孤孀子，
贫阙亲知垂济惠，
□道若能依此教，
晨昏早遣妻儿起，
共住不遥还有别，
生前直懒供茶水，
志意顺从同信佛，
柔和谏要慈亲会，
正酷热天须扇枕，
残年改易如流速，
若解在生和水乳，
争无里巷明宣说，
共树共枝争判割，
如来演说五千卷，
莫越言言宣孝须，
孝心号曰真菩萨，
孝行昏衢为日月，
孝心永在清凉国，
孝行不殊三月雨，
孝心广大如云布，
孝行万灾咸可度，
却怨庚甲有相妨。
五逆名声远近彰。
必招邻里暗迁墙。
深分交朋尚併粮。
领承教示要参详。
稍错停腾失纪纲。
倍须安衅向孤霜。
收向家中赐宠光。
崎岖道路置桥梁。
号曰慈悲大道场。
酒食先教父母尝。
相看非久即无常。
没后虚劳酹酒浆。
美言参问胜烧香。
丑漏名须自己当。
遇严凝月要温床。
甘旨供奉似火忙。
却胜亡后祭猪羊。
自有神祇暗记将。
同胞同乳忍分张。
孔氏谭论十八章。
无非句句述温良。
孝行名为大道场。
孝心苦海作梯航。
孝行常居悦乐乡。
孝心何异百花芳。
孝行分明似日光。
孝心千过惣能穰。

孝为一切财中宝，孝是千般善为王。
佛道孝为成佛本，事须行孝向爷娘。
见生称意免轮迴，孝养能消一切灾。
能向老亲行孝足，便同终日把经开。
善言要使慈亲喜，甘旨何须父母催。
要似世尊端正相，不过孝顺也唱将来。

这段长达一百多句的押座文，生动鲜明，读来扣人心弦，听来动人肺腑。遥想当年，听众围坐，由一名口齿伶俐的人从头说来，一气呵成，该有多大的感染力呀！真不愧是一篇吸引听众，令人恭闻的好的押座文。故抄写流布尚不能满足社会人民的需要，因而雕板刷印，广泛流行。这大概便是这件东西之所以出现雕印本的历史原因。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姚秦鸠摩罗什译唐五代间刻本 卷子装

卷首二十三行雕印件残破，为时人抄配。其余九十八行仍系雕印原件。麻纸印造，墨色匀黑。四周有边栏，无界行。字近行书，古朴自然。框高15.2厘米，印纸通高18厘米。卷中有多处残破。卷首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卷尾题《佛说观世音经》。

传世的《妙法莲华经》有两个系统的本子，一是七卷本，一是八卷本。七卷本最为流行，八卷本并不普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七卷本《莲华经》或者称为《法华经》的第七卷之单行者。观世音菩萨是矢志度化东土的菩萨，在中国历史上的僧俗中有较大的影响。观世音菩萨名法丰，中印度人，~~婆罗门~~种，也称为伊波勒菩萨。他在河西王沮渠蒙逊时代，以弘化为志，游化葱岭，来至河西。大开周遍法界之门，济度众生。当时河西王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语菩萨。即云观世音此土有像，乃令诵念，病苦即除。据此则知河西王当时所诵念佛经，当就是这种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其灵验，便析出别传，流布日广。案河西王沮渠蒙逊的时代，与姚秦为王的时代基本同时本经翻译于姚秦弘始八年（417），盖译出不久便别行于世了，故此经又称为《观音经》。《观音经》的析出单行，一方面使观音菩萨影响日深，一方面也使此经流布日广。待到雕板印书的技术出现之后，率先在这种经上加以利用，使之流播更广，似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其情形盖与《金刚经》首先出现雕印本类似，信奉者多，需要量大，便成了这类佛经要雕印行世的社会原因。

几乎与《观音经》出现雕印本的同时，或稍前稍后一点，唐代还出现了捺印本观世音菩萨群体排印像及雕板印刷本的观世音菩萨像，这在大英图书馆都有彼时的实物珍藏，而且有六件之多。这能进一步证明，唐代观音菩萨的普遍影响。也证明唐代后期雕板印刷的佛教经像，已不属罕见。

中和二年具注历日（残片） 唐成都府樊赏家刻本

按《全唐文》卷六二四，记载冯宿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出史剑南两川，见有私印历书货卖者。他认为有乖敬授之道，于是上疏呈请禁断：“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疏上之后，很快得到批准。同年十二月壬申朔……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这两段记载，过去诸家引用，描述唐时剑南两川已有雕板印刷的历书。虽经禁断，却始终未绝。原因大概是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历以农业为主，号称天府。版印历书，掌握农时，有利于农业发展。所以每年等不得政府正式颁发新历，民间就推算出节气时令，印卖于民。今证以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唐印本历书，深信上述记载和后人推论之不诬。

《中和二年具注历日》残片，凡存雕印文字四行。首行通栏竖题“如有人要借用了请知回□□□”。足见历书不一定家家置

备，常常是互相借用，选择良辰，测算吉凶，推演星道等。其实这种借用别家历书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乃至建国初期，广大中国农村仍是如此。盖因借者经常借而忘还或借而不还，故首行便通栏手写“如有人要借了请知送回”字样，足见这本历书的所有者是熟知民情民习并可能是身受不还之苦的。

第二行比首行缩低一字，通栏用大号字体雕印“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前边已经说过了，剑南分为东西两川是在至德二年，即公元七五七年。蜀郡改置成都府也在这一年。此处称为“剑南西川成都府”，绝计是在这一年之后了。樊赏其人无考，大概总得是一位懂得天文推步、阴阳五行的人，否则似是不敢如此自道名号的。

第三行通栏竖行雕印“中和二年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太岁壬寅”。中和二年，正是壬寅岁，为公元八八二年。

第四行顶格竖镌“推男女九曜星图”，之下横镌“行年”二字。

樊赏家雕印的具注历，虽然只剩一残片，但其较为成熟的雕印技术，仍然可见，不失为勾勒唐代雕板印刷术的发展水平和描绘唐代出版事业发展状况的珍品。稍早于此，还有一件基本完整的唐印本历书，亦藏于大英博物馆，并长年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大厅的展柜里，这就是乾符四年的历书。

乾符四年具注历 唐代刻本 卷子装

此卷框高24.8厘米，全长96厘米。四周镌有栏线，且为双边。有图有文，图文并茂。麻纸印造。字体风格，雕印技术等，与中和二年成都樊赏家雕印的《具注历》相类。岁首正月稍有残破，看不出是哪一年的历书，亦无由判断谁是这部历书的雕印主人。然其余十一个月完整无损，从闰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小、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的情况看，正月亦当是大月。七月分最下栏“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图，”图中说“今年官，羽得大利，起造拾财益人口。

商姓小利，今年起造亦吉。徵姓起造害财。角姓切忌修造，凶。宫，徵，羽三月、九月墓，凶，吉子不用。商、角姓六月、十二月墓。”既说“推丁酉年五姓起造图”，又说“今年宫、羽得大利”，则显然丁酉就是今年，今年即是丁酉。按唐代丁酉年分别为贞观十一年（637）、万岁通天二年（697）、至德二年（757）元和十二年（817）、乾符四年（877），凡五个丁酉。若是再一个丁酉，那就到了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了，故这件印刷的历书，过去一直被中外学术界推定为是乾符四年这个丁酉，我亦做如是想。前边的几个丁酉似乎过早，后一个丁酉已入五代，又似乎过晚，都不大符合这部历书的刻印风格。这部历书可以说是全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雕印本历书。它非但在天文历算上有重要研究价值，在雕板印刷史上也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和咸通九年王玠雕印的《金刚经》，九世纪雕印《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成都樊赏家雕印的《中和二年具注历》，以及捺印，雕印的菩萨像等一道，可以构成我们研究唐代印刷出版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此外，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还珍藏“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雕印的历书残片一件。看样不是四周双栏。仅存八门图中的火门，风门，木门，金门方位。视其风格及印纸，也似是九世纪的印刷品。

进入五代以后，雕板印刷技术继续缓慢发展，出现的印刷品仍是佛教经像为多，当然政府也雕印了儒家九经。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的五代时期的印刷品，主要是独幅佛像。这些佛像又构成了我们研究五代时期印刷技术和版画形式的重要实物资料。

大圣毗沙门天王像 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刻本

此件为粗麻纸印造。上图下文，唐末五代的单幅佛像画，常取这种形势。四周镌有边栏，图文之间亦镌印横行栏线。板框通高29厘米，宽26厘米。图像部分框高27厘米，文字部分框高12厘米。上图描绘的主人公是毗沙门天王，他在佛教中是一位护法的

天神，是所谓四大天王，或者说是四大金刚中的北门天。传说他神通广大，颇有灵验。唐天宝元年（742）不空三藏作法，尝请毗沙门天王显圣，因而平息了外乱，所以在唐代毗沙门天王一直被奉为军神，影响日深。直到五代，特别是在军帅中，毗沙门天王仍是被崇奉的军神。版画的结构很紧凑。一个健壮的地神，从地下挺然露出半个身躯，用他的双手擎住毗沙门天王的双足。毗沙门天王挺然屹立正中，右手持附旂长戟，左手托着供奉释迦牟尼的宝塔。头戴宝冠，旁附羽翼。双肩喷射火焰。腰间紧窄，横佩长剑。铁甲披肩，铠片鳞鳞。目光炯炯，蔑视一切；胡须上翘，毫无畏惧。充分表现了毗沙门天王的强悍性格和无穷的威力。辩才天女手捧花果侍立于左；童子与罗刹侍立于右。面目狰狞的罗刹右手高举着一个婴儿。这是为表现毗沙门天王能随时变化婴儿，普度众生的故事。整个构图，中心突出，结构严谨。线条刻划，刚劲而不呆板；人物形象，狰狞而不可恶。图像左上角的矩形条框中，竖镌“大圣毗沙门天王”。

图像下面，隔镌一道栏线，而后是竖行刻印的文字，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指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宁，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凡十四行，行与行之间镌印界线。字体凝重古朴，端庄大方。墨色纯正，刷印匀称。刀法清晰，线条流畅。表明十世纪中叶，我国的雕板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观世音菩萨像 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 曹元忠刻本

麻纸印造。印纸高32厘米，宽20.5厘米。板框高20厘米，宽13.5厘米。菩萨像及莲花座高17.5厘米。形式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相同，上图下文。菩萨像系墨印彩绘。上部经幢，莲花，衣襟均为红色，裤为白色，飘带为绿色。足下莲花座为朱墨相

间。菩萨像两边各立一莲座园柱。右柱镌“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左柱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构图复杂，人物突出。观世音菩萨妙相慈祥，神态自然。图下竖镌文字十三行，称“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使内营田押蕃落等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霑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

从这段题记看，这幅《观世音菩萨像》版画，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版画，是于同年同月同出于曹元忠之手。故其绘画，书字，镌刻刀法以及印纸墨色等如出一辙。我们在前边说过，毗沙门天王是四大天王中的北门天，于唐代被奉为军神。曹元忠作为归义军节度使，负有驻守瓜、沙等州的军事安全之责，故雕印毗沙门天王像供养布施，以祈护祐。而观世音菩萨自公元四一七年来化葱岭，治好河西王沮渠蒙逊的病患之后，亦颇为东土僧俗信奉。曹元忠作为河西的地方军政长官，一方面希望毗沙门保祐，一方面也希望合郡康宁，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观世音菩萨的护祐。故同时雕印两像，以求诸神庇护。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曹元忠刻本 册叶装式

麻纸印造。全书高13.6厘米，宽10厘米。版框高12.2厘米，宽8.8厘米。相当于现代六十四开本书大小。四周镌印粗黑单线边栏。文字间未镌界行。无版口形象，显系初期印本采取册叶装帧形式所形成的版面格式。每半叶七行，行十四字。单面印刷，今存四叶八面，似不全。首叶未印字的背面，以右半叶向左折叠，作为上封面。末叶未印字的背面，以左半部分向右折叠，作为后封面，或者称为封底。其各书叶之间，也就是左边书口，则彼此相粘连。其粘连方法，或以前一叶下半叶的左边，粘包后一叶上半叶的右边；或以后一叶上半叶的右边，粘包前一叶下半叶的左

边，使各书叶在左边书口处相衔接。也有将前一叶下半叶的左边，与下一叶上半叶的右边碰头对齐，而后从未印字的背面用窄条纸接粘的，很类似后世古书修复中的溜口。如此粘连之后，实际就形成了经折装。然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此件的装帧，并未到此结束，而是又在书册的右边，将各折书叶依次彼此粘连。这种装帧形式显然是对经折装的一种改进，同时也开了宋以后蝴蝶装蝶的先河。因为它的折叶方式（将印好的每版书叶以有字的一面为准字对字折叠），粘背方式，都是宋以后蝴蝶装的办法。所不同者，左边书口处也彼此相连，蝴蝶装左边书口则彼此不相连，故看到的先是无字的背面，此件则无这种毛病。故这件印刷品《金刚经》，在中国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演变史中，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卷尾镌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三真言后镌“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衔名三行。最后镌”天福十五年乙酉岁五月十五日记”年款。全书的最后半叶，因残而不全，似有墨印粗黑板框痕迹，看不出是否为版画。右上镌印一园柱，柱下镌“雕板押衙□□姜”字样。

按天福本无十五年，己酉已是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二年（949）。盖曹元忠以后晋天福年间受命节度瓜、沙等州，后汉推翻后晋以后，曹元忠或是不知，或是仍忠故主，所以称天福十五年。“雕板押衙”，盖指这套《金刚经》书板刷印后存于本衙，或指这套书板的雕印是由姓姜的押衙督造的。

《金刚经》早在唐代就有王玠雕印行世，又有西川过家印行，且于天复五年（905）由八十二老翁亲笔据以传抄。至五代又出现曹元忠刻本，足见《金刚经》传播之广。原因，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禅宗五祖之后，特别是自禅宗六祖之后，《金刚经》适应了当时中国的民情，无论僧俗，也无无论是否识字，不用坐禅，只须诵念顿悟。这就迎合了更广泛的需要，故一

再有雕印本出现，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曹元忠节度瓜、沙，地处西北，他主持雕印的佛教经像，有明确题名的就有上述三件传世，表明敦煌地区唐五代时是我国印书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表明曹元忠是一位忠心守土的将领、虔诚的佛教信徒及早期著名的出版家。

阿弥陀佛像 五代刻本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藏

麻纸印造，上图下文。印纸高30厘米，宽19.8厘米。四周双边。板框高26.5厘米，宽17厘米。上图框高11厘米，图与下文之间镌隔横线。下文框高15.5厘米。图文并茂，雕印清晰，亦是很成熟的印刷品。

上图部分，左右两边各于莲花座上竖一柱。右柱竖镌“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左柱竖镌“普劝供养受持。”两柱中间镌一圆圈，盖象征佛光普照。圈内莲花座上坐着全坦右胸、半坦左胸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妙相仁慈，盘禅端坐，两手下垂相交，脚心朝上。衣褶线条流畅，构图简洁传神。阿弥陀佛，亦称无量寿佛，其图像有显教、密教之分。密宗阿弥陀佛有胎、金之分，显宗阿弥陀像有坐、立之分。显教阿弥陀的坐像、立像，皆为螺发之出家形。其坐像，结定印，是为照智而寂理体胎藏之意，是阿弥陀佛成道自利之像。此印本阿弥陀佛为坐像，盖为显教之阿弥陀佛像。

像下竖镌文字十三行，称：“夫欲念佛修行，求生净国者，先于净处置此尊像，随分香花，以为供养。每至尊前，冥心合掌，离诸散动，专注一缘，称名礼敬。南无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愿共诸众生，一心归命，礼十拜。南无极乐世界，大慈大悲诸尊菩萨，一切贤圣，一拜。然后正坐，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或万或千。观世音大势至诸尊菩萨各一百八，念已称云。以此称扬、念佛功德，资益法界，一切含生，愿承是善，声同正念，往生无量寿国。更礼三拜，即出道场。”字体遒劲

凝重，雕印精良。虽无明确年款，但观其印纸墨色、字体刀法，构图风格，与前述曹元忠在瓜、沙地区刻印的经、像极为近似。甚至我仍怀疑此件还是出自曹氏节度瓜、沙的时代和那一地区。

文殊师利菩萨像 五代刻本 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东方部都有收藏 且残品及完整无损者竟有好几件 麻纸印造 上图下文

上图部分，左右各有镌绘的双边长条状匾联：右镌“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左镌“普劝志心供养受持”。中间镌印文殊菩萨像。文殊菩萨坐狮而行，普度众生。狮子倔强不驯，昂首雄健。但被护法天神所牵制，又表现得无可奈何。护法天神拽缰身体稍向后倾；雄狮扭颈而又头向天神。神、狮相望，不但形象逼真，而且彼此的性格也跃然纸上。文殊菩萨顶结五髻，以表大日之五智；手持利剑，以表智慧之利剑；驾坐雄狮，以表智慧之威猛。文殊像有种种差别，如一字文殊、五字文殊，六字文殊、八字文殊；一字文殊、五髻文殊、八髻文殊、几文殊等。其中以五字、五髻文殊为本体。菩萨像妙相庄严，背后佛光缭绕。前边有童子合拾拜谒。构图严谨，中心突出，笔调简洁，刀法清晰。

图下镌印三道横线为栏，下面镌刻文字十三行，称：“此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变现多般，威灵叵测，久成正觉。不舍大悲，隐法界身，示天人相，与万菩萨住清凉山。摄化有缘，利益弘广。思惟忆念，增长吉祥。礼敬称扬，能满诸愿。普劝四众，供养归依，当来同证菩提妙果。文殊师利童真菩萨五字心真言，阿上啰跋左曩文殊师利大威德法宝藏心陀罗尼，唵引阿味罗佉引吽左络。对此像前，随分供养，冥心四境，专注课持，迴施有情，同归常乐。”印纸墨色，字体风格，刀法技巧，均与上述曹元忠雕印的经像近似。故其版印亦不会晚于五代。

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还藏有唐代晚期刻印的三尊像版画、观世音菩萨像版画，五代刻印的地藏菩萨像版画、普

贤菩萨像版画、千辐陀罗尼轮版画及开运四年曹元忠雕印的观世音菩萨像版画等，总共近三十件。纵观这些印刷品，大大有利于唐五代印刷术发展的研究，也大有利于唐五代出版事业的研究。过去研究唐五代刻书，多从文献出发，原因是见不到实物。现知光英国就藏这么多唐五代的印刷品。如果再加上法国巴黎所藏敦煌遗书中的此期印本，什么时候能加以综合考察和研究，则于唐代的雕板印刷术的发展状况，大概总可以勾出个粗线条的轮廓。前边只是重点地介绍了几件，尚不敢说是准确。先抛出来供更多的人研究。

〔待续〕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清光绪时售书价格一例

清吴汝纶撰《桐城吴先生全书》六种，于光绪三十年刊印出售，其中四封面刊印价格，余二种仅作附录无价格，当时的价格是：

第一种《易说》 每部定价库平足银贰两

第二种《尚书故》 每部定价库平足银叁两

第三种《文集》 每部定价库平足银贰两

第六种《尺牍》 每部定价库平足银叁两

除此之外，又见该版的二个后印本，其价格与上不同。其一，第六种《尺牍》标价：每部定价库平足银叁两与文集合售共肆两捌钱 其余三种标价同上。其二，只在总目前封面用朱文印有“每部定价大洋五元整”一行，其余几种没有标价，知大洋五元实为全书之价格。

• 李国庆 •
